

# 學鑒

【第五辑】

■ 司马朝军 主编



武汉大学出版社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985工程』项目成果

# 學鑒

【第五辑】

司马朝军 主编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鉴·第5辑/司马朝军主编.一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9  
ISBN 978-7-307-10049-7

I. 学… II. 司…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75051 号

---

责任编辑:聂勇军 责任校对:黄添生 版式设计:詹锦玲

---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20.5 字数: 292 千字 插页: 2

版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10049-7/C · 326 定价: 40.00 元

# 目 录

## 古 典 新 论

- 通之道 ..... 吴根友 (3)

## 经 史 扱 微

- 仁民与尊生：“公刘居豳”与“古公迁岐”的儒道精神 ..... 丁四新 (73)  
楚礼研究刍议 ..... 杨 华 (101)  
也谈《论语》中的“人”与“民” ..... 杨逢彬 (116)  
崔述的疑古史思想与乾嘉时代的史学解放 ..... 吴根友 (137)

## 诸 子 新 证

- 管氏“三归”进解兼论管仲知礼而孔子责备于贤者 ..... 程水金 (173)

## 四 库 专 论

- 四库学研究的战略思考 ..... 司马朝军 (185)

## 典 籍 辨 伪

- 《里堂书品》真伪考 ..... 司马朝军 (201)

## 文化创新

生命心理学导论（修订版） ..... 师 领（277）

后 赞 ..... 司马朝军（322）

古 典 新 论

学 鉴



## 通 之 道

◎ 吴根友

“通”作为当代中国哲学的问题，也是作为世界之问题，是中国自晚明以来与西方社会的接触，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与西方世界打交道而逼出的新的哲学问题，也是近代世界地理大发现，资本主义的海外殖民给全世界各民族带来的新的哲学问题。近代中国的变法烈士谭嗣同，以其敏锐的哲学灵感，提出了“仁以通为第一义”的光辉哲学命题，努力依托中国固有的思想资源，对传统儒家，特别是宋明以后发展起来的新仁学——仁者以天地为万物为一体的精神来诠释“仁学”的核心精神，从而第一次在哲学层面清晰而又合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逻辑的方式，使中国哲学与“世界哲学”<sup>①</sup>的精神发生了内在的关联。现代西方哲学史中，有众多哲学家思考了“世界哲学”的问题，他们虽然没有提出“通”的概念，但也具备“通”的观念。康德的“世界公民”观念，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所揭示的世界一体化过程，马克思所揭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理想以及共产主义理想，雅斯贝尔斯的有关“世界哲

---

① 在一次会议上，有学者提出以“全球哲学”来代替“世界哲学”概念，可能更好。姑备一说。

学”的思考，无不包含了“通”的观念。要从人类精神文明史的角度考察“通”的观念演变史，然后建构出以“通”为核心观念的哲学形态，显然不是本文所能胜任的工作，而且也不是一个人、几个人所能胜任的工作，因而也不是本文所要追求的理论目标。本文的主要理论目标在于：对于“通”的观念在中国古代汉语中的一般运用状态作一粗线条的勾勒，然后对《易》哲学传统中的“变通”，道家的“道通为一”，谭嗣同的“仁以通为第一义”等思想、命题作一简明的论述，在此基础上对当今世界的“技术”与“道”的关系问题，和“通”之道作一初步的思考。希望能从中国哲学传统出发，将“通”作为当代中国哲学与世界哲学的问题提出来。①

## 第一部分 “通”观念的思想史考察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作为一个普通的语词的“通”，其本意是“达”的意思。许慎《说文解字》云：“通，达也。”《吕氏春秋·审应览第六》《具备》篇云：“故诚有诚乃合于情，精有精乃通于天。乃通于天，水木石之性，皆可动也，又况于有血气者乎？”②《吕氏春秋》的作者认为，一切物之“精”可与神性的天相通，一旦与天相通，则无情之物都可以活动，而有血气的人与动物更能表现出神性的特征。可见，人天相通的重要性。

依现代人的研究成果来看，“通”在古代汉语中的意思有一百多种，③ 择其要有如下 11 种意思：（1）达、至；（2）行；（3）顺、

① 本人对中国哲学史中“通”的概念与观念的关注，大约始于带领学生读《仁学》一书，然将“通”上升为一哲学的观念，先受友人商戈令兄的启发，后因 2011 年 12 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哲学高等研究与浙江大学语言与认知中心合办的首届“哲学：中国与世界”论坛的激发而在台北“中研院”写出了三万余字的初稿。在此基础上，又不断丰富补充，变成现在的文字。

② 张双棣、张万彬、殷国光、陈涛：《吕氏春秋译注》，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628 页。

③ 参见宗福邦、陈世饶、萧海波主编：《故训汇纂》，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2290 ~ 2291 页。

畅；(4)共、同、举；(5)开；(6)连；(7)深；(8)知；(9)道；(10)卷；(11)辙(古代赋税单位)，十井为“一通”。作为“通”的哲学思考则主要选择其中动词与形容词的义项，强调通的行、达、顺畅、知道等意义，从而建构一套既符合当代中国与世界要求的状态，又与中国传统哲学精神有内在联系的哲学思考方式。由于笔者目前的学力有限，“通”的观念在世界其他民族中是如何表现的？暂时不去涉及。此处也仅是提出一初步的论述，更加详细、精深、圆融的论述俟待来日。

## 第一章 “通”在中国语言、文化中的一般意义

作为一种思想史的观念而言，“通”的意思非常丰富而且复杂。特别是经过《易》哲学，《庄子》哲学，以及宋明儒学，直到近代谭嗣同的不断阐发，“通”作为一种思想史的观念，其意义与内涵的丰富性，到目前为止，在中国的思想界与学术界似乎还没有得到一次很自觉而且很系统的清理。据笔者所知，对于“通”的观念史的清理工作，到目前为止，还只是少数人在从事研究，目前已经取得了少量的初步认识成果。<sup>①</sup>不过，中国古人对于“通”的思想观念是情有独钟的，司马迁在《太史公书》(即今俗称《史记》)一书中，将自己的历史写作任务就规定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言。”而由司马迁所开创的“通史家风”在后来的历史著作中不断得到回应与发展。唐代史学家刘知幾作《史通》一书、杜佑作《通典》；宋代史学家司马光作《资治通鉴》、郑樵作《通志》；明清之际的哲学家方以智作《通雅》，清代史学家章学诚作《文史通义》，以“通”命名的史学著作代不乏人，而以“通”命名的篇章就更多。王

<sup>①</sup> 就笔者所知，商戈令较早从“通”的角度论述了“道通为一”命题的新意，并尝试对“通”作出更系统的论述。见《哲学研究》2004年第7期。近日看到乔清举在台湾大学举办的儒释道三教会通的会议上提交了一篇从中国自然哲学的角度论“通”的文章。他的文章题目是《论中国自然哲学的“通”的思想及其生态意义》，该文主要是从中国自然哲学的角度论述中国哲学史中出现的“通”观念，与本人的思考路数不同。

充在《论衡》一书高度赞扬“通儒”、“通人”。而宋代哲学家周敦颐将自己的哲学著作命名为《通书》。直到现代，“通论”、“通史”之类的著作，层出不穷。但从思想史的角度对“变通”、“通”进行系统论述的，似乎还只能从刘勰、刘知幾、章学诚等人说起。刘勰《文心雕龙·通变》篇说：“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然绠短者衔渴，足疲者辍途，非文理之数，乃通变之术疏耳。”<sup>①</sup>

刘勰在讲“通变”的问题时，一方面讲“通变之数”，即对各种文学手段的融会贯通；另一方面讲“凭借以会通，负气以适变”，即依托创作者的感情来会通各种体裁及表现手法，以实现文学创作的创新。“通变”是古与今之间的整合与融通，然后实现文学创新的必经之路。

刘知幾在《史通》序文中说道：“昔汉世诸儒，集论经传，定之于白虎阁，因名《白虎通》。予既在史馆而成此书，故便以《史通》为目。且汉求司马迁后，封为史通子，是知史之称通，其来自久。博采众议，爰定兹名。”可见“史学”即是“通古今、天人”之学。

从思想观念史的角度看，章学诚对“通”的意义阐释得最为丰富。他在《文史通义》一书中，专门辟有《释通》一文，第一次从文化史的角度解释了“通”的观念及“通史”类著作的发展史，通过对“通史”不同类型的分析与批判，彰显了人们对“通史”的种种理解与误解，从而在文化史的论述中揭示了“通”的观念史的丰富性与歧义性。

首先，章学诚从“广同人之量”的角度重新解释了《易》哲学“惟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一句中“通”的意思。他认为，《易》哲学这句话无非是说：“君子以文明为德，同人之时，能达天下之志也。”“夫先王惧人有匿志，于是乎以文明出治，通明伦类，而广同人之

<sup>①</sup> 刘勰著，周振甫校注：《文心雕龙》，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30页。

量焉。”①所谓“广同人之量”，即是说圣王通过对天下人心志的理解，以文明的形式来治理天下，让更多的人生活在圣王的治世之中。

其次，他“从严畔援之防”的角度重新阐释了《尚书》“乃命重、黎，绝地天通”一句中的意思。他认为，《尚书》中这句话无非是说：“人神不扰，各得其序也。”“先王惧世有棼治，于是乎以人官分职，绝不为通，而严畔援之防焉。”当然，章氏的这种说法是在尊重先王政治权威的前提下加以解释的。从现代政治学的角度看，“绝地天通”即是运用政治权力垄断祭祀权，从而在宗教意识上垄断不同部族的人对天地鬼神等超越性力量的解释权。章学诚对《尚书》中“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的解释，并未揭示上古政治权力垄断神权的历史意蕴。

通过对《易经》与《尚书》中“通”与“不通”——专司其职的两种相反意思的分析，章学诚将中国文化史上的两件大事纳入“通”与“专”的两种观念之中。他说：“自六卿分典，五史治书（内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学专其师，官守其法，是绝地天通之义也；数会于九，书要于六，杂物撰德，同文共轨，是达天下志之义也。”②这即是说，传统政治活动中的职业分工可以溯源于“绝地天通”的各司其职的宗教祭祀活动，而后代政治文化中的九数、六经无非是《易经》时代圣人以卦爻词通达天下之志的一种扩展版。这是章学诚处在乾嘉时代，以他自己所处时代学术专业化的历史情境来解释上古政治实践中的职业分工现象的，有合理之处，也有缺乏说服力的地方，如他将传统政治活动中的职业分工溯源到“绝地天通”的各司其职的宗教祭祀活动，就没有多大的说服力。

再次，章学诚又从经学发展史和古代典籍发展的角度揭示了“离经而别自为书”的“通书”的历史起点及其演变过程。他认为，

①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36页。

②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36页。

最先出现的“通书”是“总五经之要，辨六艺之文”的汉代石渠《杂议》，后来“刘向总校五经，编录三礼”，“俱题通论，则通之定名所由著也”。<sup>①</sup> 真正以“通”命名典籍的是班固的《白虎通义》和应劭的《风俗通义》。而在中国经学史上，有些著作虽然没有标出“通”字，然在实质上是“通书”之类的著作，如集解、集注、异同、然否、圣正、匡谬、兼明等类型的书，“其书虽不标通，而体实存通之义”。<sup>②</sup> 章学诚认为，这种“经部流别”的历史演变过程不能不加以辨别。这就表明，在中国学术史上，“通”的观念并非就是直接以“通”的语词、概念来表达的，而是有其他的语词与概念来表达“通”的观念，从而显示了“通”的观念在学术史上具体表现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这一点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就历史类的著作来看，梁武帝主持编纂的《通史》，是史学类的第一本“通书”。之后有杜佑的《通典》、郑樵的《通志》、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著作。在章学诚看来，“通史”类著作有六大方便之处：“一曰免重复，二曰均类例，三曰便诠配，四曰平是非，五曰去抵牾，六曰说邻事。”<sup>③</sup> 特别是像《通典》、《通志》、《资治通鉴》之类以专题形式表现出的古今贯通的“通史”，已经不同于司马迁的“通史”观了，但在“通古今之变”的哲学思维形式上又是一致的。

章学诚特别表扬了郑樵“独取三千年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sup>④</sup> 这其实是夫子自道，含蓄地表达了他自己追求“通史家风”的学术理想。不过，章学诚自己所追求的“通史家风”既不同于司马迁在《史记》中表现

<sup>①</sup>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36页。

<sup>②</sup>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37页。

<sup>③</sup>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39页。

<sup>④</sup>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49页。

出的通史观，也不同于郑樵的通史观。此处不能深论，需要专文讨论三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最后，章学诚还从文字训诂的角度，将“通”解释成“通达”之意。他说：“《说文》训通为达，自此之彼之谓也。通者，所以通天下之不通也。读《易》如无《书》，读《书》如无《诗》，《尔雅》治训诂，小学明六书，通之谓也。”<sup>①</sup>章学诚在此一层意义上所说的“通”，其实是对专书或专门知识的理解与贯通，与专门性的知识和技术有关。“通”具有跨越理解不同门类学问（知识）的边界与障碍的意思。他本人在追求“通史家风”的过程中，对于世俗社会一些炫耀学问博通，其实并不博通之人，专门取了一个名字，称之为“横通”。这种“横通”与真正的“通”之意貌似而实不同。章学诚认为：“不可四冲八达，不可达于大道，而亦不得不谓之通，是谓横通。横通之与通人，同而异，近而远，合而离。”<sup>②</sup>而章学诚理想中的“通”之意是：“通之为名，盖取譬于道路，四冲八达，无不可至，谓之通也。亦取其心之所识虽有高下、偏全、大小、广狭之不同，而皆可以达于大道，故曰通也。”<sup>③</sup>章氏在此意义上所说的“通”比较接近我在下面所阐述的“通”的哲学精神了。不过，他仍然以绝对的“大道”为中心，而没有与“无限”相通的观念。在知识论的领域，其实所有的人都只能是半通不通之人，因为人生有涯而知无涯。人只有在精神境界上与“无限”相通，不断地超越已有的成就，让道通向无限而不隐于小成。

章学诚在论学问的“博约”关系时，也涉及通与专的问题，他说：“道欲通方而为学须专一。”<sup>④</sup>“学必求其心得，为必贵于专精，

<sup>①</sup>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40页。

<sup>②</sup>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62页。

<sup>③</sup>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62页。

<sup>④</sup>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19页。

类必要于扩充，道必抵于全量，性情喻于忧喜愤乐，理势达于穷变通久，博而不杂，约而不漏，庶几学术醇固，而守先待后之道，如或见之矣！”<sup>①</sup>应该说，章学诚对于学问“博约”之间辩证关系的论述，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但具体到历史上的大思想家、大学者而言，都很难真正做到“博而不杂，约而不漏”。历史上的真实情况大体上都是博而含杂（即体系之内有一定的矛盾性）、约而有漏（因为学术宗旨与关注重点的缘故）。章学诚的说法只有理想性、方向性的意义，而不具有真实性。

要而言之，章学诚对“通”有非常深刻而系统的思考，他认为“通”不仅是“扩乎其量而未循乎其本”，求通之方恰恰是因专而求其通，达于道。他说：“薄其执一而舍其性之所近，徒泛骛以求通，则终无所得矣；惟即性之所近而用力之能勉者，因以推微而知著，会偏而得全，斯古人所以求通之方也。然则学者不患不知通之量，而患无以致通之原；盖欲自得资深，然后学者取资左右而无絰也。”<sup>②</sup>章学诚的意思是说，“通”可以由专家之学出发，然后“推微而知著，会偏而得全”，最后达到“自得资深”，可以由专家之学而进入通人之学。然而由于受时代环境与他个人学术志向的限制，他的《文史通义》的着眼点在于天地之间所著述的精神相通性论述，而并非对“通”本身进行哲学思考。但他的这些思考对于我们今人更加深入而系统地思考“通”之性与“通”之象的问题，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思想资源。他的思想成果值得我们尊重。

## 第二章 变通——《周易》哲学的古代智慧

对于中华民族而言，《周易》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一本经典著作了。我们不说人人皆知，至少可以说稍微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

<sup>①</sup>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20页。

<sup>②</sup>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95页。

点了解的人都听说过《周易》这本书，而且越是在普通人的眼里，其神秘的光环也就越亮。而在历代的经学研究著作中，有关《周易》的研究著作也可以说是最多的一类。《周易》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方面都有联系，尤其是《周易》与中医，《周易》与中国古代天文、历法，均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于《周易》中蕴涵的哲学精神，可谓言人人殊。但在笔者看来，《周易》的根本精神还在于知变（或曰预变），从而达到御变，处变而不惊。在御变的过程中实现由穷而通，由通而久。变通而恒久，可以说是《周易》一书所要追求的根本价值目标。

《周易》一书分经、传两部分，经部分卦爻辞的内容比较隐讳，需要通过对经学史的历史解释来加以理解。在经学的历史解释过程中，也形成了一些相对固定的意思，如乾卦的“卦辞”中“元亨利贞”之“亨”，一般就解释成“通”，以显示天道通达无碍之意。而“坤卦”《文言》则说：“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黄色为中和之色，故以此喻中和的美德。中和的美德在内，则能通达万理，从而成就人间的事业。在《周易》“传”的部分，论述“通”、“变通”的文字很多。可以这样说，《周易》一书的根本精神就是讲“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sup>①</sup>的道理。《易》哲学在变化的世界面前绝不是毫无作为，恰恰是要通过对变化的把握，而尽得天下之利，故《易·系辞上传》说：“变而通之以尽其利。”“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

《易》哲学是如何规定“通”的呢？《系辞上传》对“通”有一个明确的界定：“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所谓“往来不穷”既指时序方面的春夏秋冬、昼夜变化的无穷性，如《系辞上传》的作者说，“变通配四时”，又称“变通莫大乎四时”。这即是说，易哲学中的“通”首先表现在时间序列上的无穷尽性，正如《系辞下传》的作者说：“变通者，趣时者也。”趣，通趋。而这种趋时，即是指人事世界趋时而更新，能够适应变化了的生活世界，它以高度

---

① 井卦就是“穷而通”。

的灵活性来展示易哲学在任何具体的环境下都能实现人的目标的理想，故《系辞下传》又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易传》的作者甚至将人类之事的性质界定为“通变”，说“通变之谓事”，从而与大业、盛德等并行在一起。“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

由以上简单的分析可以看出，《周易》一书就是阐述“变通”的道理，并要求人们在变化面前保持一种智的流动性，从而能实现知变、御变，以尽天下之利的现实目标。《周易》一书经与传两部分涉及“通”的观念，其根本意思就是行得通，无所滞碍。析而言之，大体上可以分成以下四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是“变通”。这一层意思应当说是最基本的意思。从自然的变化角度看：“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而《易》哲学的主要精神就是要求人们知变，然后能正确地应变，从而让人能在天地宇宙、人类社会生活中正确地处理各种事情，实现人类“正德、利用、厚生”的大目的。《系辞下传》说：“刚柔者，立本者也。变通者，趣时者也。”

《易传·系辞上》说：“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而《易》哲学所讲的“通”，其最抽象的意思是“往来不穷谓之通”。与现代人讲的实现人类的自由自在的意志相通。

就社会生活而言，“通变”的具体内容，其一是指“通天下之志”，如《系辞上传》作者说：“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而且还说：“夫《易》，圣人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因为“圣人通天下之志”，则可以“定天下之业，断天下之疑”。

其二是指神明之德。《系辞下传》讲：古者包牺作八卦，其目的是要“通神明之德”（两次出现），“类万物之情”。这与古代宗教精神有关。人类社会生活总是与某种神秘的力量联系在一起，故圣人之业要与神明之德相通，与万物之情相通。

如何实现“通变”呢？《系辞上传》作者说：“寂然不动，感而遂